

烽火 曙光 源流 通道 前哨 熔炉 关钥 和合

观察

全国罕见 东北独有 汉代辽东的“样板乡聚”为何被遗忘

本报记者 王晓翎 文 本报记者 孙明慧 摄

在辽宁辽阳太子河西岸的一片冲积平原上，静卧着一处距今2000多年的汉代村落遗址。它的名字叫三道壕。如今，知道它的人并不多。在知网检索“三道壕”关键词，仅有十余条相关文献。研究成果寥寥，与这处遗址的实际价值形成不小反差。事实上，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是全国罕见、东北独有、规制完整的汉代大型聚落遗存。它保存着西汉时期辽东地区普通百姓的生产生活痕迹，为今天的人们了解汉代东北社会文化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样本。



制图 董昌秋 部分素材由AI生成

辽宁文脉绵长，古遗址、古遗址遍布各地，但其中有不少像三道壕一样，长期处在公众视野之外。早在1955年，著名考古学家、博物馆学家李文信就发表了《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发掘报告。70余年过去，这处遗址依然鲜为人知。学术资料的稀缺，恰恰说明它还有太多值得深耕之处。

不一般的聚落

梳理三道壕遗址的考古脉络，首先需要澄清一个常见误解：这并非一处普通的汉代乡村，也并非军事屯戍驻地。

遗址位于辽阳太子河西岸的冲积平原，汉代时是辽东郡治襄平（今辽阳）的近郊。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郑君雷介绍，遗址整体占地面积约100万平方米。这个规模远超一般秦汉乡村聚落，甚至超过许多汉代县治城址的面积。即便仅发掘1万余平方米，仍然清理出6处居住址（发掘平面图上标出了第七居住址）、11眼水井、7座砖窑、两段铺石道路，还有368座儿童瓮棺葬。遗迹分布规整有序，功能分区清晰，展现了一个布局完整的汉代聚落。

有人评价其为汉代“规划有序、设施完备”的宜居社区，规整程度堪比现代小区。郑君雷认为，这种说法虽略有夸张，但该遗址的规划性与完备性在汉代边疆聚落中确实少见。

6处居住址都是独立宅院，间距保持在15至30米，互不干扰又紧密相连。所有宅院呈两排规整排列，房屋大多朝南或偏东，偏西向开门，采光合理，布局通透。院内水井、菜园、猪圈、牛马栏、厕所一应俱全，生活配套相当成熟，打破了人们对汉代北方村落简陋粗糙的固有印象。宅院周边分布着砖窑，各居住址之间有卵石路和铺石大路相连。居住、生产、生活

区域划分清晰，形成了成熟的聚居体系。

结合出土遗存与聚落特征分析，三道壕遗址具有农、工、商混合的特点，显然不是普通自然村落。郑君雷表示，三道壕位于辽东郡治襄平附近，属于“边塞”地区中的“内地”，与抚顺至沈阳一线的燕汉长城还有一段距离。墓地均按“宗族关系”或“宗族组织”埋葬，成人墓一般为夫妻合葬，不太可能是士兵驻扎的屯戍据点。一般聚落中出土兵器也属正常。

排除自然村落和屯戍据点的可能，三道壕的性质应在“乡”或“聚”的层面上考量。用今天的话说，大致相当于县以下、村以上的行政单位。居民以农业生产为主，兼营工商业，宜称为辽东边郡的汉代乡聚遗址。

不寻常的经济生活

辽阳博物馆研究馆员马鑫向记者提供了一组数据：三道壕遗址共出土各类文物19万件，数量大，种类也多。“这处遗址最鲜明的标签，就是发达的农耕文明。”马鑫说。辽阳东部山区铁矿资源丰富，当地冶铁业在西汉时期已经相当成熟。遗址里出土了犁铧、耧脚、锄头、铁铲、铁耙、镰刀等全套铁制农具，品类齐全，形制规整。这足以证明西汉时期辽东地区已经普及了比较精细的农耕技术。

一同出土的还有炭化高粱。这说明2000多年前，高粱已经是东北的主要农作物之一。而就铁农具工艺水平而言，三道壕工艺放在同时期的全国乡村遗址中也排在前列。换句话说，汉代东北的农业发展程度，并不比中原差。除了成套农具，其他出土遗存也值得关注。郑君雷把话题引向了聚落更多元的生产生活方式。他说，这里发掘出了陶盆、陶罐、陶盆、陶钵等大量日用陶器，其中一部分陶器上刻有“昌平”“军厨”等字款。“这很可能

是区域外销的商品化器物。”郑君雷说。此外，铁铸、铁凿、铁钻头等专业铁制工具，适用于矿业加工，说明当地有常年性、常态化的手工业生产，也有农闲时的副业生产。

三道壕还出土了铜铁兵器、玛瑙和琉璃珠饰、耳珰等装饰品，还有刀钱、“一刀”小圆钱、“小半两”等流通货币以及各类车马构件。

“千秋万岁”瓦当、云纹瓦当、筒瓦、绳纹砖、陶井圈……这些高端建筑构件的发现，同样让人印象深刻。郑君雷分析，这些构件除了满足本地聚落自用，结合遗址内规模化砖窑的遗存来看，很可能也用于外销。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也曾在《汉代农业》一书中提出，汉代的三道壕村落遗址中发现了许多用来烧瓦的窑，但从其原始的结构与有限的容量看，这种生产并不是全天候的。不过，在那里至少发现了一个由两个一样的窑组成的复合窑，说明当时可能已经通过两个窑的轮流使用，在向全天候的生产发展。或许可以推断，他们的产品同样要在外地的市场上销售。中国国家博物馆著名学者孙机曾经算过一笔账：按照汉代手工业的技术水平推算，遗址内的砖窑每年可以生产约60万块条砖。规模化、产业化的手工业生产，加上活跃的区域商贸，都体现了这个乡聚的经济活力。

从日常炊具、生产工具，到建筑构件、流通钱币，大量出土文物拼出了一幅西汉辽东百姓生产生活的完整图景。这也是中原文化向东北传播与融合的直观见证。像“千秋万岁”瓦当、云纹瓦当这类器物，是汉代较高等级聚落的标志性建筑构件，进一步佐证了三道壕乡聚的特殊地位。而陶器上的“昌平”“军厨”字款，则是当时区域物资调配和商贸流通的直接物证。成套的手工业工具、车马器以及各类流通钱币加在一起，恰好勾勒出一幅农商并举、商贸流通的汉代辽东边疆发展图景。

郑君雷还提到一个容易被忽视的细节——祭祀遗存。“部分古井中发现的完整马骨和人骨，并不是村落废弃后留下的。”他告诉记者，这些遗存很可能与汉代的“井祭”仪式有关。正是这些看似特殊的发现，为研究汉代民间信仰和民俗文化提供了难得的考古证据。

转机出现在1954年。辽阳当地文物工作者邹宝库发现了异常遗存，并上报到省里。李文信带队实地勘探后，确认这是一处大型西汉聚落遗址，紧急叫停了施工。但1955年正式发掘时，原本100万平方米的完整遗址，仅残存约1万平方米未被破坏。大量核心遗存已经永久消失，成为考古界的一大遗憾。

如今，距离那次发掘已过去70余年，三道壕依然冷门。为什么会这样，郑君雷向记者分析了原因。他认为：一方面是因为学术界对汉代乡聚遗址的研究关注度偏低，相比于都城遗址、墓葬遗址，乡村聚落研究长期处于边缘地位；另一方面，公众考古普及不足，优质的乡土历史资源没能走进大众视野。他举例说，与河南省内黄县三杨庄同等规模的汉代聚落遗址相比，三道壕的知名度、传播度和研究成果都有较大差距。

我们为什么要关注它？郑君雷的回答很直接：三道壕遗址拥有无可替代的学术价值。这样一处重量级遗址，不仅为研究汉代乡聚的行政属性、生计模式、空间布局、人口规模与日常生活场景提供了鲜活的样本，更直观印证了汉代中原文明对东北边疆的深度融合。这正是古代各民族交融共生、东北地域融入华夏大一统格局的重要物证。

被低估的文化遗产宝藏

三道壕遗址的核心价值是什么？马鑫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它见证了西汉时期中原文化与东北地域文化的深度融合。”

西汉时期，辽阳称襄平，是辽东郡治所在地，也是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

在场

一件铁犁见证东北古代农业高度

本报记者 王晓翎

巨型农具

这件文物出土时的实测数据：长40.2厘米，后宽40.6厘米，釜口高13厘米，重19公斤。这是一件典型的汉代大型全铁犁铧。“铁器的普及应用，是辽阳古代农业发展的一次重要进步。”董平说。

1955年，三道壕遗址考古发掘工作正式启动。在出土的众多文物中，农业生产工具数量最多，有铁铧、铁铲、铁锄、镰刀等。而这件巨型铁犁铧，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件。

董平介绍，这件铁犁铧以铸造为主，局部锻磨加工，结构稳固，受力均匀，能够有效增加耕地深度，疏松土层，保水保墒。这些技术特点在当时属于领先水平。为了验证它的实际耕作能力，后人曾进行复刻试验，结果很明确：该犁可稳定入土15.5厘米，耕作拉力大，作业稳定性强。如果用一头壮牛或两头牯牛拉拽，可持续耕作两小时。

“它的耕作能力优于同时期普通农具，适合大规模农田开垦和深耕作业。”董平说。

在三道壕遗址还出土了灌溉水井、粮食加工石磨以及各类耕作、除草、收获农具。董平认为，这些遗存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汉代农耕生产体系，“从播种到收获，从灌溉到加工，各个环节都有对应的工具和设施。”

体系完善

西汉时期，襄平（今辽阳）为辽东郡治所在地，是汉代东北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辽东郡的基本情况：辖18县，覆盖今沈

“很多人提到汉代农业，首先想到的是中原地区。实际上，东北地区在当时也有很高水平的农业文明。”辽阳博物馆研究馆员董平这样说。

她所说的证据，是一件出土于辽阳三道壕西汉村落遗址的巨型铁犁铧。后世称之为“辽阳大铁犁”，如今收藏在中国国家博物馆，被收录在《中华农器图谱》中。



辽阳大铁犁

阳、鞍山等区域，户籍5万余户，人口超27万。朝廷在辽东郡专设铁官，官营冶铁作坊，推动了铁器制造走向规范化、规模化。

有了产业基础，农具的生产与普及才有了保障。董平说，辽阳地区发现多处汉代铁矿遗址，出土了铁钺、铁锤、铁钻子等工具。“这说明当地拥有较为完整的冶铁产业链，能够自主批量生产铁质农具。”她举例说，从太平沟、牌路沟等遗址出土的采矿工具，以及区域内出土的耕种、除草、收获、加工农具，都印证了汉代襄平地区农业体系的完善。

依托本地冶铁产业，辽东地区率先实现了铁农具的全面普及。从开荒破土、整地起垄，到春耕除草、秋收加工、农田灌溉，农具配套齐全，技术体系完善。对比当时其他地域，董平说，战国至西汉早期中原地区大多使用节省铁料的铁口犁——仅在木犁外镶嵌铁刃，结

构相对简单。而同期辽东襄平地区，已使用全铁巨型犁铧，体量达到中原犁铧两倍以上，性能和工艺均处于领先水平。这种适应辽东环境的专用犁具，被学界命名为“辽东犁”。

为什么需要这么大的犁？董平给出了解释。辽东地区冬季漫长，冻土坚硬，春季地温偏低，普通小型农具难以完成深耕作业。巨型全铁犁自重重、刃面宽，结构稳固，能够有效破开冻土、深翻土层。通过起垄耕作抬高土层，可以提升地温，优化田间光照条件，缓解低温对农作物生长的制约。

董平还提到了另一个功能：这把犁兼具开沟作用。“它可以直接用于农田沟渠开挖和水利修缮，提升灌溉效率。”一件农具同时解决耕地和开沟两个问题，在当时是很实用的设计。

这种巨型全铁犁的使用，推动了辽东荒地开垦与耕地拓展。董平认为，这标志着汉代东

北土地开发正式进入规模化、精细化的阶段。

农耕兴盛

在全国农耕技术逐步推广的背景下，辽东凭借先进的犁具技术和成熟的耕作模式，成为汉代农业发达地区之一。农具革新提升了农耕产能，辽东形成了稳定的农业格局。董平引用古语来形容当时的农业状况：“拽把扶犁，麦秀两歧。”意思是耕作有序，庄稼长势好，一穗麦子出两个麦穗，形容丰收景象。

农业经济的持续发展，为后来的历史进程提供了支撑。董平告诉记者，东汉末年公孙氏治理辽东时，能够维持区域稳定，与当地充足的农业产出有直接关系。

辽阳汉魏壁画中描绘的市井生活，也是汉代辽东农耕兴盛的反映。董平说：“壁画里能看到炊煮、宴饮、庖厨等场景，如果不是农业有富余产出，这些不会出现在墓葬壁画中。”

辽阳大铁犁出土至今已有70余年，长期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但董平认为，公众对这件文物的了解还远远不够。“辽阳大铁犁就是直接的证据。”她说，“我们现在研究汉代东北，不能只依靠文献记载。像这样的实物，才是最有力度的证据。”

在董平看来，辽阳大铁犁不仅是一件农具，更是汉代辽东地区农业发展和文明开拓的历史缩影。它印证了古代东北并非荒芜边陲，而是拥有成熟农耕文明、手工业体系和社会秩序的区域。这件文物为研究汉代东北发展史和中华农耕文明多元格局提供了实物依据。让更多人了解它背后的历史，是当下最应该做的事。

国宝AI了

一个顶十个

本报记者 孙明慧

1955年，在辽阳北部的三道壕村，考古队挖出了我国第一个大型西汉村落遗址。里最震撼的宝贝，竟然是一把距今2000多年的“铁犁铧”。它可算得上是当年的“农业黑科技”了：牛拉着它，破土深，松土快，还能锁住土里的水，一犁下去，能顶10个人刨地。

那个年代，能用上这样大铁犁的村子，到底有多少先进呢？



扫码观看视频



辽阳大铁犁 张宏摄